

地權社群與地方體制能力： 理解中國大陸農村徵地衝突*

陶 逸 駿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北京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摘 要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進程中，大量農地面臨轉制，徵地過程卻常見衝突耗損。本文旨在理解此類現象與體制運作過程機制，並透過實地參與觀察及案例比較指出：產權衝突不僅在於正式法規缺陷、村集體退化，或者村民自治結社不足，更需考量鄉村政治社會歷史脈絡、社群和基層行政的動態連結，乃至地方體制的策略及能力。

農地產權在基層社群脈絡中形成，進而以融合傳統村社、差序格局與現代制度元素的「地權社群」實踐政治經濟生活。若地權社群具較高自治力，卻未能充分連結基層行政集體，將萌生誘發衝突不穩的「維權性」。一旦社群行動浮現，而地方體制未及施展相應減壓能力，則衝突過程將形塑產權認知更一致、行動更鮮明的社群。地方體制從而在上下壓力間適應、求索、學習、軟硬兼施。當體制掌握更多訊息，能力更加強大，所能選擇的策略也愈益多元。群眾工作、信訪封鎖、傳媒管控、消耗分化、暴力壓制等策略的交互運用，能夠削弱社群維權性。而行政權責調整則使省、市級決策得以隱身體制背後，從而實現對政權整體的自我保護。

關鍵詞：中國農村、徵地、維權、地權社群

* * *

* 本文改寫自作者碩士論文：轉型經濟下的產權耗損—中國農村徵地協商案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2008年）。承蒙清華經濟系劉瑞華老師悉心指導。感激中研院政治所徐斯儉老師、政大社會系劉雅靈老師、中研院社會所陳志柔老師在研究計畫暨論文口試的懇切建議，以及台大政治系趙永茂老師、徐斯勤老師、北京清華政治系景躍進老師、張小勤老師對概念思路的提點啟發。政大政治系林超琦老師在2010年中國研究年會對初稿的評論、青年導演周逸民和政大王敬智師兄在英譯的協助，乃至編委會與匿名審稿老師認真盡職的精彩意見，也裨益良多，在此一併致上謝忱。

壹、引言與問題^①

2005 年 7 月初，中國大陸 X 市政府公布了位於城郊 H 區 Q 鎮的「OT 職業教育園區」項目，並舉辦隆重的開工儀式，省市多位領導幹部親臨視察、剪綵。數日內，鎮政府著手執行徵收區內土地，範圍涵蓋許多農村，而在首期工程就面臨全村徵收的「勤村」，被地方媒體稱為園區建設的「主戰場」。7 月中旬，鎮政府人員進入勤村測量青苗與補償條件，然而直到 8 月中，村民都未見任何正式公告文件，也未獲知任何具體補償安置訊息。村民陸續開始表示不滿，也不願承諾搬遷。經過半年多協商，村民的期望仍無從滿足，民怨糾紛與日俱增。2006 年 3 月下旬，幹群間終於爆發暴力衝突，多達 1 千多位勤村村民參與其中，數十位村民遭到毆傷，其中不乏重傷住院者。

衝突過後，憂慮且憤怒的村民紛紛畫押為盟、捐獻路費，由兩位勤村村民「老丁、小丁」，與附近同樣被徵地的「風村」村民「老馮」一同擔任代表，前往省會上訪。不料省府相關單位表示「無法處理」，幾位村民代表遂決定直接進京。4 月下旬，3 位村民迂迴避開重重截訪，將資料呈交「國務院和全國人大」的信訪辦，此後事態看似有了轉機。據稱進京上訪後地方政府部分資金遭凍結，並且不再施暴。隨後補償協商開始分別達成，迄 2006 年 8 月，1 千多位村民的大多數已接受各自談判結果，遷往趕工落成的安置小區，只餘下 10 戶約 30 多位村民在上訪領袖老丁領導下繼續堅守。^②這些村民在房頂高懸紅旗「依法抗爭」，陷入對峙僵局。附近其他區域則開始按方案興建。此時，園區與鎮街級規劃整合，和改制 Q 街道的 Q 鎮落實「街園合一」，重組廓清行政權責，在名義上將行政層級與日常事務均限定在鄉鎮科級。

直至 2007 年 1 月中，H 區政府發下強拆令，再使情勢急轉直下。10 戶村民中社群關係較為邊緣的決定遷離，但多數寸步不讓。2 月，區政府在信訪回覆中再度峻拒村民訴求，同時以「經重新研究」為由撤銷強拆令，卻旋即發出新的強拆令，如此發布後撤銷反覆 3 次。4 月初某日午夜，在村民睡夢中，政府派遣的大批警力與拆遷人員忽然強行進入老丁家裡，將老丁的家人逮捕。老丁和村民起而抵抗，爆發激烈衝突，千百位早已遷往安置房的村民紛紛趕往現場吆喝助陣，還有村民逮住警察。衝突在當天晚上結束，老丁終於選擇妥協，房舍很快被夷為平地，其餘留守村民也在群龍無首

註① 本文當中關於勤村案例的關鍵人名、地名，一律採用化名，包括「勤村」、「丁初」、「馮興」等。而「老丁」、「老馮」是村民間來往的暱稱。此後文中故事敘事部分為符應村內語境，原則上以暱稱呈現（村內極少人會稱老丁為「丁初」）。但新聞報導、政府文件等資料採用化名（畢竟這些地方也不會出現「老丁」），但以括號加註暱稱，如「丁初（作者註：老丁）」。這些修辭某些程度也反映出地權社群中的「我群」、「他者」意涵——如果一個人稱老丁為「丁初」，那他很可能並不屬於老丁這個社群。

註② 這種拒絕搬遷而成為工程障礙的住戶，俗稱「釘子戶」。不過由於「釘子戶」事實上帶有一點「礙眼礙事」、「令人頭疼」的負面意涵，因此本文大多情境下將以「拒遷村民」來指涉這些不願妥協的農民。

下陸續遷離。幾天內，勤村大致完成拆遷。事後各級官方媒體一致定性：數位村民因「暴力抗法」名義遭拘。老丁被依「妨害公務罪」起訴判刑，2009 年中始得獲釋。期間勤村及附近群眾尚有不少人持續關心，奔走營救，甚至串聯加入維權組織。而老丁獲釋後雖獲安置，也仍嘗試繼續行動，但地方體制秩序的挑戰，看似暫時得到緩解。

儘管事件告一段落，但無論從何種觀點來看，如此農地轉制過程大概都很難視為理想、順暢、合乎效率的。村民維權期間，肥沃的農地未能生產原本年年豐收的水稻與蜜桃；宅基地無法讓村民安居樂業，也難以落實原訂園區工程。不僅村民在精神與物質的損失難以估計，就連許多政府幹部也深感棘手。不只一次的激烈暴力衝突與終告罔效的維權行動，同時虛耗官民的利益。開工儀式的冠蓋雲集，在數年間恍若隔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成就受到舉世矚目。而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中，新城鎮與開發區範圍急速擴張，各種非農用途的土地經營模式，持續且大規模浮現在原本的農地上，凸顯農地轉制的強烈需求。《土地管理法》第 63 條第 1 款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③在城鎮與開發區的興建項目中，需由政府先以公共利益名義，將集體所有的農地轉為國有，爾後才能運用於規劃的非農用途。而徵收集體農地，依法應給予農民補償安置。《土地管理法》第 47 條規定：「徵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然而，徵收補償過程往往一波三折，在基層引發的衝突也並不罕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課題組曾對進京上訪的農民進行問卷調查：進京上訪原因涉及土地問題者，佔有效問卷比例高達 73.2%。而分析 837 封有關農村土地的上訪信，屬於「非法、強行徵用土地」的佔了 33.1%，「土地補償款過低或被侵吞」佔了 22.9%，兩項因素數量已逾樣本總數之半。另外這些信件中，村民聯名信比例高達 75.1%，遠高於村民小組公章的 14.7%與村委會公章的 4.1%。^④十多年來，這類現象未曾緩解。如新華網報導：「2013 年 5 月，國土資源部下發禁止『暴力徵遷』的緊急通知，然而，一些地方無視禁令，屢闖紅線，黑保安、社會閒雜人員等參與暴力徵遷激化矛盾」，以致於 2014 年 8 月的新華網在參閱國家統計局資料後，依然能夠基於許多農地衝突案例明確指稱：「徵地拆遷問題始終佔全部上訪案件之大半。近年來群體性衝突事件中，有一半與土地問題相關，大部分為徵地拆遷引起。」^⑤

倘若這些數據與案例足堪我們粗略瞭解農村徵地情況，應可進一步推論：農地問

註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修正版本）」，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中國政府法治信息網，<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fkgd/xfg/fl/200409/20040900052441.shtml>。

註④ 于建嶸，「土地問題已成為農民維權抗爭的焦點——關於當前我國農村社會形勢的一項專題調研」，調研世界（北京），2005 年第 3 期，頁 22~23。于建嶸在結論提及：「課題組認為，農村土地糾紛已取代稅費爭議而成為目前農民維權抗爭活動的焦點，是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首要問題。」檢閱隨後的新華網報導，可以相信這個結論在 10 年後的今日依然成立。

註⑤ 「土地矛盾高發，當防權力侵蝕權利」，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4-08/03/c_1111913649.htm。

題在中國嚴峻的基層維穩形勢中，持續佔有相當份量，且農地徵收引發的幹群衝突，正是農地問題的典型。前述勤村案例正屬一例。而作者所接觸的諸多相關案例當中，勤村作為沿海發達省份的行政村，自然村仍相對明確，所處區域又恰以高速經濟發展與強大政府能力著稱，強社會遭遇強政府，政治社會互動衝突層面較多、持續期間較長、結構鮮明完整——卻仍以地方體制略佔上風，得以具體凸顯經濟發展中的官民土地矛盾過程。其事態相較於 2011 年著名的廣東「烏炭事件」的特殊性質與機遇，^⑥也別具普遍性和參照意義。

2006 年 3 月勤村首次暴力衝突發生後不久，我經由當地朋友開始瞭解事件情況。11 月勤村深陷僵局，強拆山雨欲來，我在老丁引領下數度進入村內訪談，也現場見證幹部圍堵談判和部分拆遷工程。基於純粹學術研究目的，為求訊息周全，其後逐漸將接觸對象擴及安置小區中範圍更廣的一般群眾——特別在老丁等人遭遇強拆被捕後。^⑦當風頭暫息，2007 年 5 月中開始，我斷斷續續寄宿在安置小區及附近農民朋友家中，至 8 月底離開。此後保持聯繫，也多次回訪。儘管不能如部分村民最初期望的施予援助，但荏苒 10 年，與許多村民——現在該稱市民了——早已成為老友，對地方嬗變也有親身而共通的感受。透過長期深入追蹤與實地參與觀察，反覆對照考量言談見聞真實度，本文旨在圍繞勤村徵地衝突過程，參酌比較相關事態，嘗試理解：中國當前體制下的高速經濟發展過程中，農地轉制與重組過程何以在特定情境誘發一系列官民矛盾、資源浪費的租值耗損（rent dissipation）現象？契約糾紛因循何種制度機制，又鑲嵌在何種背景條件與結構遺緒中？

進一步的問題則是：倘若這種制度現象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並非罕見特例，為何得以強韌延續？地方體制何以吸納制度成本，又開啓何種轉變空間？可能需要說明的是，依據中國慣常語境，本文提及的「地方」體制是相對於「中央」而言，意指省級以下體制。而「基層」則專指「區縣級」及其下，包括鄉鎮、村居。本文融合產權契約與傳統社群性質，以「地權社群」概念類型與地方體制策略能力的關聯，理解農地衝突現象的過程機制動態，乃至體制整體的自我穩定能力。質言之，是透過概念類型動態的推演，嘗試讓這個約莫 10 年前啓始、長期餘波盪漾的勤村案例，作為中國農地制度現象「變動與僵固」的參照系，進而反映晚近農地治理變革的取向和限制。

註⑥ 2011 年廣東汕尾陸豐烏炭村的農地衝突事件，特別受到矚目。但本文認為，烏炭村有其不易取代的特殊機遇。首先由於與香港的地緣關係，幾乎在事件之初就湧入境外媒體；其次，當時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被認為是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共十八大的去向受到海內外高度關注，因此某種意義上這成為一個特具高度政治意涵的事件，超越了徵地衝突本身。

註⑦ 至於地方政府立場，在媒體宣傳之外，大部分反映在他們發給村民的字條、文件，以及具體採取的行動上。我透過不同立場的村民獲得這些資料，因此沒有主動涉險要求接觸當時已嚴陣以待的地方政府。

貳、確權論、集體論與自治論

對於中國農村改革現象的著述，除了政策層面觀點以外，理論觀點以制度經濟學蔚為主流，^⑧而「產權觀」是制度經濟學的典型運用。作為產權觀的代表性學者，周其仁曾指出正式制度缺陷：「集體如何補償失去土地承包權的農戶，並沒有法律規定，在實際上常常五花八門，可以便宜行事。」^⑨法規中雖然明定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歸地上附著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安置費則視安置單位而定，但由於一般農民仍需村集體協助安置，安置費仍由村集體管理使用，實際執行時，大部分款項往往也必須透過集體組織發放。周其仁以河南登封鐵路徵地案例指出：「因為被徵地農民沒有法律許可的『還價權』，就只好通過上訪上訴、甚至採取超越現行體制許可的其他集體行動，來影響補償額的最後決定。」^⑩而福建閩侯東南汽車城的案例也強化類似觀點：「真正決定政府向農民支付徵地補償款下限值的，惟有農民的上訪、上訴和採取其他集體行動的壓力。」^⑪他從而認為，政府徵地代價不高，與農戶無從參與徵地補償談判有關：「有權去談補償條件的只是『集體』，而實際上的集體常常不過就是幾個鄉村權力人物。」^⑫這似乎並非穩定理想的狀態。

大抵而言，產權觀往往將徵地亂象解釋為正式制度對產權界定及實踐的「明晰程度不足」。除周其仁以外，厲以寧、文貫中、蔡繼明等學者也都曾由雷同的「私有制缺陷」路徑作為解釋，進而主張在政策上推行土地私有制或類似制度如「土地股份合作制」，以使產權更為明確。^⑬近年來，由周其仁領軍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綜合課題組」透過系列調研，以成都城鄉統籌發展經驗，具體凸顯「集體土地直接入市流轉交易」，而「確權」是土地流轉的前提和基礎。^⑭

對於以「明晰私有產權」與「農地流轉入市」為核心的「確權論」，主要質疑來自土地國有與集體所有的視角，而以賀雪峰為代表。賀雪峰雖然承認土地開發分配收益

註⑧ 應星，*農戶、集體與國家——國家與農民關係的 60 年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

註⑨ 周其仁，*產權與制度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10。

註⑩ 周其仁，*產權與制度變遷*，頁 95。

註⑪ 周其仁，*產權與制度變遷*，頁 99。

註⑫ 周其仁，*產權與制度變遷*，頁 111。

註⑬ 文貫中，「解決三農問題不能迴避農地私有化」，*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http://www.cenet.org.cn/cn/ReadNews.asp?NewsID=23813>；蔡繼明，「中國的現代化、城市化與農地制度改革」，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編，*政治經濟學研究報告—中國農業、農村與農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頁 116~126；厲以寧幾乎已經是股份制與私有化的代言人之一了，較為親近「集體論」的李昌平便曾對「厲股份」的觀點提出質疑。見李昌平，*我向百姓說實話*（內蒙古：遠方出版社，2004 年）。

註⑭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綜合課題組，「還權賦能—成都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的調查研究」，*國際經濟評論*（北京），2010 年第 2 期，頁 54~92。

問題引起村莊農民持續、大規模的上訪告狀，且自 1990 年代以來一直沒有間斷或稍歇，但他認為，農民土地維權問題主要原因是工業化與城市化帶來巨額土地增值，而國家透過徵地的形式拿走了大部分。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雖然支付給農民很高的徵地費，但地方政府並沒有將土地市場化的所有收益支付給農民，或者說，地方政府往往將部分因為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收益截留下來，而沒有完全返回失地農戶。有時候，地方政府在徵地中，支付給農民的徵地補償款，明顯低於土地市場的價值，引起農民及村集體的不滿。」^⑮他堅稱農地問題並非由於產權不明晰或受到侵害，而只是在土地巨額增值當中，農民希望獲得更多利益。賀雪峰相信，這些「可以享受到土地增值好處的失地公民，較中國絕大多數不能享受到土地增值好處的農民的處境，已經好得多了」，^⑯因而不是農村社會穩定發展的首要問題，農地集體化不僅不是農地問題的解釋，而且是社會保障和發展建設的助力。這種強調集體地權功能的觀點，我們且稱之「集體論」。

「確權論」在學理邏輯上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在論述上受到廣泛採用。不僅如此，在政策上也獲得許多試點空間。從 2007 年的物權法，到 2013 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中「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及「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等提法，都蘊涵濃厚的產權觀色彩。而以農地入市為要旨的「成都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也在 2014 年 1 月獲得中共中央編譯局的「地方政府創新獎」。儘管如此，制度確權在概念與經驗推展上仍面臨一些質疑。首先，大量「依法抗爭」或「以法抗爭」，直接或間接以法律作為訴求依據。^⑰農民抗爭往往並非正式制度不足，而是由於徒法不足以自行。我們一則不能將解釋完全歸諸政府立法作為，再則即使中央政策出台，各地效果往往有所落差。換言之，解釋須擴及制度實踐與變遷的非正式規則與情境因素，而非僅限正式制度本身，「一刀切」的法令規章可能誘致更強烈衝突。2005 年廣東南海三山地區（屬桂城街道）發生近年較為激烈的徵地抗爭事件，迄今未獲完滿解決。而南海正是「土地股份制」產權改革最重要的試點地區之一，卻由於村幹部私自簽署移轉集體土地股權，引起普遍不滿。^⑱事實上，「南海模式」激化許多矛盾，^⑲使農民受到代理人侵害，^⑳甚至促使制度退向土地國有化，直接導致南海模式的終結。^㉑這都不是理想的確權論所能充分解釋。確權本身有賴組織程序連結的公共協商、代表性決策，是種因地制宜的政治過程，但主張確權的學者較少聚焦於此。周其仁課題組研究中提到成

註⑮ 賀雪峰，*地權的邏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78~79。

註⑯ 賀雪峰，*地權的邏輯*，頁 80。

註⑰ 于建嶸，「當代中國農民維權活動的一個解釋框架」，*社會學研究*（北京），2004 年第 2 期，頁 50。

註⑱ 來自作者在廣東南海的田野筆記，2012 年 11 月 30 日。

註⑲ 馬健，「南海模式：創新與困局——對南海土地股份合作制發展狀況的調查」，*農村工作通訊*（北京），2008 年第 17 期，頁 16~17。

註⑳ 劉愿，「農民從土地股份制得到什麼？——以南海農村股份經濟為例」，*管理世界*（北京），2008 年第 1 期，頁 75~81。

註㉑ 劉憲法，「『南海模式』的形成、演變與結局」，張曙光主編，*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土地卷（第 8 集）*（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0 年），頁 69~132。

都柳街鎮的「村莊評議會」，^②似乎仍需概念化處理，畢竟走出成都，未必每個地區都適合在原本村集體之外另建一個「評議會」。

「集體論」同樣面臨挑戰。如前所述，目前農村徵地衝突事件中，村民的主張往往依據中央相關的法律和規章，要求的只是國家規定的合理補償，未必是增值的部分；其次，村民失去農地後，原本自用與出售的作物需要另外耗資購買，若未獲生計所需補償，甚或失業下崗，在物價高昂的城鎮生活中處境很難「比大多數農民好得多」。以 Q 鎮相關案例看，能到園區擔任保潔的已屬幸運，不少農民只能到外地作為民工、到城市收廢品變賣維生，甚至不乏鋌而走險從事違法詐騙者，這不僅成為社會隱憂，也嚴重削弱農民動遷的誘因；再者，對集體組織抱持期望的同時，「集體論」一般也忽略了集體組織決策和農民之間的代表與監督關係，包括農民對「集體」的制約能力與選擇空間——缺乏這些，不易論證集體對衝突緩解的作用。簡言之，也許農地產權確實不夠明晰，村集體也有其功能，但不足以周嚴解釋農地衝突過程。

張德元觀察到「集體」的困境，以國家對土地「宏觀調控權不足」的角度進行解釋，從而主張土地國有和賦予農民永佃權。他認為「集體」可依此理順為兩類：村委會為代表的「社區性村民自治組織」，以及農民們在新的土地關係下組建的「農業集體經濟組織」。^③「自治」的圖像逐漸浮現，但國有土地、自治集體到市場產權，仍須更多連結。華生在規劃管制與市場配置間的立場較為折衷，雖然他不否認「隨著城市化過程的演進，集體所有制的自然淡化、解體和消失是一個自然和不可避免的過程」，^④但也不認同土地開發「回歸產權人的私權利」。華生眼中重要問題在於「什麼靠規劃，什麼靠市場」，指出「發達國家的規劃都要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機構批准方為有效，法院也是依立法機構而非行政機關的意見來判定徵收私產的公益屬性」，並非「按照產權人的市場交易規則」運行，而當前中國需要「大刀闊斧改革、改進政治決策程序」。^⑤

當「自治」、「代表」和「程序」等概念進入視野，就不難意識到農地產權無非是個政治問題。而代議立法之外，在基層決策程序更多還是表現為協商治理。那麼誰來協商？如何協商？秦暉和黨國英較早嘗試以基層政治視角，超越土地集體或確權的纏鬥。黨國英指出，農地產權制度關鍵在於「村民自治制度」，^⑥納入集體與農民間的協調與代表關係。秦暉則認為土地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爭論意義不大：「歸根結底，掌握地權的不是老百姓（農民），就是官府（官員）。如果農民有結社權，可以自由結成『集體』，那麼土地歸農戶還是歸這種集體，並沒有原則上的區別（在國外民法中它們都算「私有」）——即便有區別，農民自己也可以作出選擇，而無須他人越俎代庖」。^⑦他亦認

註②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綜合課題組，「還權賦能——成都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的調查研究」，頁 82。

註③ 張德元，「新型土地租佃制度芻議」，經濟前沿（廣州），2003 年第 4 期，頁 36-38。

註④ 華生，新土改：土地制度改革焦點難點辨析（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 年），頁 8。

註⑤ 華生，新土改：土地制度改革焦點難點辨析，頁 58。

註⑥ 黨國英，「以民主自治攻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難題」，中國農業信息（北京），2010 年第 7 期，頁 6-8。

註⑦ 秦暉，「農民地權六論」，社會科學論壇（河北），2007 年第 5 期，頁 123。

為「在當前條件下侵犯農民的公民權益往往是通過侵犯農民的合法土地權益表現出來的，因而保障農民地權不受侵犯是維護農民公民權的一個重要底線。」^⑧柳建文等更進一步，將「賦權」(empower)過程視為「保障土地流轉合作持續下去的充分和必要條件」，^⑨這些觀點將集體自治溯及制度形成與實踐的民間自主空間，甚或更為抽象的「公民權利」，雖然掌握要點，但仍落入將民間自主力量與組織空間解釋歸於正式制度安排的窠臼。實際經驗中，倘若一個區域的農民毫無自組織能力與意願，那麼單向結社權在現行基層體制下反而可能使得「集體」成為派性黑惡勢力的禁嚮—倘若賦權需要某種體制能力運作過程，那麼這個機制似乎不能一概而論。

本文認為，要理解農地衝突現象與制度機制，不應僅是指出「缺乏某些正式法令規則」，也不應歸因於「傳統村集體功能退化」。產權的形成情境，以及農民與集體間的實際關係，應同時納入考量。它們各自受到基層脈絡因素影響，且同時面對體制能力的決策施加。問題在於，特定情境脈絡連結下的村民有何類型，何以呈現不同形態的政治經濟行動？衝突耗損的過程如何牽動制度機制運作？基層體制又如何吸納、轉移與化解這些成本，從而鞏固體制的宏觀存續？

參、地權社群與體制能力

一、地權社群

回歸產權理論經典文獻，Coase 曾以土地為例指出：「我們也許能夠說某人擁有一塊土地，並且將它作為生產要素，然而，土地的所有者實際上擁有的是一項權利，這項權利使他可以進行有限的行為。」^⑩Demsetz 也提出：「一組財產權利是附著在具體的商品或勞務之上，且正是這組權利的價值，決定了被交換的商品或勞務的價值。」^⑪換言之，任何一項財產實際上是「關於這項財產的權利」及「這項權利所面臨的約束」構成的組合。依此權利與約束結構所能透過交易契約獲得的利益價值，決定了這項產權的租值 (rent)。產權結構不僅如 Coase 所說的存在局限，而且可能面臨侵入與切割。Alchian and Demsetz 便認為：「資源不同用途的範圍，可在一些人之間進行切割。不止一方可以宣稱對於同一項資源擁有部分所有權的利益。一方可能擁有耕種土地的權利，而另一方，也許是國家，可能擁有橫越的通行權利，或者將土地用於某些

註⑧ 秦暉，「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與農民權利保障」，*探索與爭鳴*（上海），2002 年第 7 期，頁 16。

註⑨ 柳建文、孫夢欣，「農村徵地類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及其治理—基於衝突過程和典型案例的分析」，*公共管理學報*（黑龍江），2014 年第 2 期，頁 101~114。

註⑩ Ronald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 No. 1 (October 1960), p. 44.

註⑪ Harold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7, No. 2 (May 1967), p. 347.

特定目標。」^②徵地補償案例中，農民的期望與處境狀態，正取決於產權情境的實踐效果，並呈現為「產權安排」(property rights arrangement)。當產權安排存在不確定性，行為者便存在競逐產權租值的誘因，引發奪取行為、甚至暴力紛爭。各種尋租 (rent seeking) 現象彼此扞格，帶來負外部性，增添制度成本，進而反噬產權蘊涵的租值。Gordon 在探討公海捕魚競爭現象時，對於因產權不明確甚至不存在，而在競逐過程中虛耗產值的情況，提出了租值耗損 (rent dissipation) 概念。^③不難理解：產權安排形塑契約的交易過程與成本。產權安排不清的情況下，契約存在較高交易成本，使產權租值發生耗損；反過來說，一旦產權界定清晰，而契約交易流轉順暢，那麼無論初始分配情況如何，最終都會達成配置效率——著名的 Coase 定律 (Coase theorem) 似乎已呼之欲出。「確權論」所符應的正是張五常對 Coase 定律的解讀：「權利誰屬要有界定，私有產權是也」。^④

然而，產權不清不僅來自正式產權制度缺陷，也源於「農民產權意識」與「政府實際產權執行」之間的不確定性。O'Brien and Li 的「依法抗爭」(rightful resistance) 觀點，以被承諾的權利與實際能夠達成的權利之間的落差，解釋農民維權抗爭。^⑤張靜則認為：「在政治關係和法律關係未經分化（區分）的制度結構下，不存在包含統一原則和限定性合法聲稱的系統，結果是多種規則並存，並分別有各自的合法性。規則的執行過程變成規則的選擇過程，它遵循政治競爭而非法律衡量原則。」^⑥農村徵地事件中，村民和地方政府各自依據的產權，分別受到所處規則脈絡形塑。Denzau and North 曾以「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 Model)，指出個人理性應當置於社會制度當中來理解，^⑦個人心智模式受到過去經驗以及來自他人的訊息牽引，使得群體認知逐漸產生共同性。這個架構下，村民的產權觀源自法規，也來自基層社群關係中的「我群、他者」。有別於「產權是一束權利」的基本命題，周雪光強調「產權是一束關係」，認為「一個組織的產權結構和形式是該組織與其他組織建立長期穩定關係、適應其所處環境的結果」。^⑧產權原是在集體與社會關係中形成的，應星對此說得更清楚：「像是社區隱性的、非正式的社會合約，這種合約並不是依據法律來達成的，而是各當事人

註② Armen A.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 3 (March 1973), p. 17.

註③ Howard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o. 62 (April 1954), pp. 124~142.

註④ 張五常，*經濟解釋卷三—制度的選擇*（香港：花千樹，2002年），頁48。

註⑤ 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註⑥ 張靜，「土地使用規則的不確定：一個解釋框架」，*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3年第1期，頁113~124。

註⑦ Arthur T. Denzau and Douglass C. North, "Shared Mental Model: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Kyklos*, Vol. 47, No. 1 (February 1994), pp. 3~31.

註⑧ 周雪光，「『關係產權』：產權制度的一個社會學解釋」，*社會學研究*（北京），2005年第2期，頁1~31。

根據廣泛認同的公平原則，在互動中建構出來的。」^③

賀雪峰曾將涂爾幹的社會關聯（solidarity）概念運用於中國農村的社會關係，強調村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具體關聯。他認為：「村莊社會關聯關注的是處於事件中的村民在應對事件時可以調用村莊內部關係的能力。當一個村民被種種強有力的關係掛在村莊社會這個網上面，這個村民就可以從容面對生產生活中的事件，他具備有效降低生存風險，經濟獲得公共物品，從容談判達成互贏協議，以及穩定建立對未來生活預期的能力。」^④因此，村莊社會關聯是村民利用彼此關係面對實際問題的一種資源，包括共享訊息及回應地方政府產權決策的分割與侵入。賀雪峰進一步說明：「村莊社會關聯是指在村莊內村民因為地緣關係（同一自然村或同一居住片所產生的鄰里關係）、血緣關係（宗親和姻親關係）、互惠關係（禮尚往來和生產互助產生的關係）、共同經歷（同學、戰友、生意上的合伙人）以及經濟社會分層產生的社會契約關係和權威一服從關係等等，所結成的人與人之間聯繫的總和。」^⑤亦即，村莊社會關聯來自於許多形態的結構背景。

這是「集體論」的基礎，實際上卻應當比集體論本身更具理論活力。楊磊等提出的「混合地權」制度系統，具體涵蓋「財產權利、公共治理、社會關係、觀念習俗」四個維度，^⑥從勤村案例看來，農村產權實踐除了來自土地法規和自治制度，也立基於村內政治社會情境條件，包括血緣、地緣、社會關係、政治文化傳統、能人領袖教育感召、組織制度遺緒，並仍依循費孝通所謂「差序格局」。而 1950 年代土地集體化背景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公社制度，和 1970 年代末農村的工業化與人口流動，為傳統家庭結構帶來重大轉型，^⑦也影響了家族、社群的產權運作和行為方式。在大傳統（1949 年前）、小傳統（1949 年後）與現代性因素相互鑲嵌、交融的社會基礎上，村民共享產權意識、形成群體、採取策略—或者發生分化，構成面對地方體制的行動和機制安排。鄧大才區分「產權單位」和「治理單位」概念，並以兩者間「對稱性」聯結和實現的「關聯性」，來解釋產權治理績效，無疑是個有益的嘗試。^⑧不過首先，「產權單位」仍是個相對靜態的概念，著重於產權制度形式，而忽略產權實踐過程機

註③ 應星，〈農戶、集體與國家—國家與農民關係的 60 年變遷〉，頁 86。應星並指出這些原則包括「生存原則、劃地為界原則、成員均等原則、誰投資誰受益原則」等。

註④ 賀雪峰，〈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4。

註⑤ 賀雪峰，〈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頁 6。

註⑥ 楊磊、劉建平，〈「混合地權」的制度分析及其實踐邏輯—基於 Z 村村民小組的個案分析〉，〈社會〉（上海），2015 年第 2 期，頁 218-240。

註⑦ 王天夫、王飛、唐有財等，〈土地集體化與農村傳統大家庭的結構轉型〉，〈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15 年第 2 期，頁 41-60。一般相信，中國農村家庭變革的動力機制來自 1970 年代末期開始的工業化，王天夫等人則強調，早在 1950 年代中期，集體化已開啓傳統家庭結構轉型。本文將農村家庭結構變革視為一持續過程，而以更具彈性的「社群」作為主體。

註⑧ 鄧大才，〈產權單位與治理單位的關聯性研究—基於中國農村治理的邏輯〉，〈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15 年第 7 期，頁 43-64。

制的動態類型——「產權」是在選擇行為與集體行動的試錯、博弈過程當中實踐、積累、建構出來的。產權與治理體制發生關聯，也必須經由這個過程。換言之，沒有基於產權的行為、行動，產權與體制間也不會呈現關聯。其次，「產權單位」對微觀動態的忽視，也反映在其「自上而下」的視域。這個視域當中，承載基層社群的產權單位很大程度是由體制與歷史決定的。基層社群往往是在時代洪流中「被動發生關聯」，因而不理解當代一些重要的微觀事實和變遷歷程。事實上在產權行為和行動的「連結」動態過程中，體制和基層行動者都兼具結構和能動性。產權治理體制類型不只是宏觀產權制度類型所決定，更深受微觀行動實踐形態的形塑。

產權是透過選擇行為乃至社群行動來實踐的。而中國農村基層的「產權社群」(property rights communities) 又與土地密不可分。本文採用一個衍生自組織行為假設的中層概念「地權社群」(land rights communities) 作為分析主體，^⑤來描繪事態圖像：這是一種圍繞農村土地、以地緣關係為核心的社群，如費孝通所謂「地緣是契約社會的基礎」，^⑥而具有對農地產權契約的行為共識。在此基礎上，社群融入傳統社會關係、公社制度遺緒、現代性法制規範和體制機制。部分社群更具較高的相對自主性，在基層事務擁有自組織的「自治力」。高自治力的社群往往有個具才幹的領袖人物，如臧得順所謂「謀地型鄉村精英」，^⑦但又較其主張的「關係地權」更具組織形式與能動性。地權社群的邊界受行政村影響，惟不同於正式規制色彩濃厚卻日益走向模糊的村集體(village collective)，同一村集體中，可存在多個地權社群。有時更近似自然村或生產隊，邊界卻又未必與之重合，社群彼此也存在流動，只能從政治經濟生活的長期實踐過程中展現。而相較於杜贊奇(Prasenjit Duara) 所謂「權力文化網絡」(culture nexus of power) 的實踐形式，^⑧地權社群聚焦於土地產權契約共識，指向產權和相關行為主體類型，考量但不限於象徵與規範(symbols and norms)。此外，在實踐過程中與當代國家體制能力和法律法規，也有更為清晰、具體而頻繁的互動。

這個實踐過程不能完全等同現行體制的「村民自治」，也比「以社區、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試點」的「自治下移」蘊含更豐富的可能性。^⑨領袖未必就是村幹部，並且與基層行政體制產生強弱不一的「連結度」。當一個地權社群（或其公認的代

註⑤ 這個行為主體假設，是參照 Douglass C. North 於 1980 年代對制度理論的努力：在新古典主義的「個體」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之間，以交易成本為基礎的「組織行為假設」另闢蹊徑。劉瑞華譯，Douglass C. North 著，*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5 年），頁 viii。本文在此基礎上，試圖面對組織行為假設在運用時往往偏於正式化、抽象化理解規則的問題，以「社群」這種有點建構性（相對於唯理性）的行為假設，來處理中國的社會動態特質和傳統元素。

註⑥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74。

註⑦ 臧得順，*謀地型鄉村精英的生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註⑧ 王福明譯，杜贊奇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

註⑨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574736.htm。鄧大才將這類調整探索稱為「自治下移，政務村務分離」，見鄧大才，「產權單位與治理單位的關聯性研究——基於中國農村治理的邏輯」，頁 61。

表人物) 得以透過共識程序涉入村內政治過程, 或普遍認同政治過程結果, 具有較高連結度; 而當連結度較低時, 則可能以協商談判、集體抗爭、尋求管道維權等行動方式介入基層政治。倘若具自治力的地權社群充分連結基層行政體制, 將成為「協調性社群」, 如成都模式「村莊評議會」與行政村的協調關係。這種「協調性」的行動實踐和近年中央文件中「協商民主」理念若合符節, 受到主旋律垂青自不令人意外, 也構成鄧大才所謂「自治下移」的話語背景。另一方面, 缺乏自治力的地權社群若與基層體制連結密切, 可能形成受到基層黨政或派性自上而下把持的「從屬性社群」。1950 年代土改鎮反, 鏟除許多基層菁英士紳, 傳統村社自組織能力遭受嚴重破壞, 而土地集體化對家庭結構的影響, 也斷傷宗族的自治規模。在改革開放後的體制能力滲透下, 這類慣於依附體制的社群並不罕見, 成為村民自治的重要困境, 也較無力展現為農地抗爭。至於具高度自治力、卻與體制缺乏連結的地權社群, 傾向形成「維權性社群」採取回應行動。而與體制連結薄弱的社群, 若自治力被體制策略與能力進一步分化 (如勤村), 或者自始缺乏社群自治力 (如鄰近的風村), 行動往往轉為 Scott 所謂「弱者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在勉為妥協之後採取一種「日常抵抗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⑩這種抵抗形式對地方體制沒有立即威脅, 但可能引致制度虛耗及政府合法性危機。本文基於這種社群與體制間的消極關係, 將之稱為「疏離性社群」。

一個地權社群可能由於歷史地理條件, 譬如傳統文化、宗族勢力、政治運動程度、生產隊規模、甚至地形格局等因素, 而成為某種初始類型。^⑪後因經濟轉型、結構變遷、政府體制策略等種種複雜因素, 嬗變、分化或退縮為其他類型, 直到在城市化過程中逐漸原子化, 最終可能失去社群形態, 或轉由其他抽象原則凝聚。表 1 的四種地權社群類型中, 「協調性社群」、「從屬性社群」與「疏離性社群」, 都是對於地方體制秩序相對穩定的社群, 只有「維權性社群」是為體制運行帶來立即威脅的社群形態。而近似鄧大才所謂「對稱性」的「協調性社群」, 由於對「社群自治力解放」的高度要求, 在當前基層黨建方針邏輯下, 不易成為治理體制整體的常態趨勢—這些動態圖像, 或許比「產權單位」和「治理單位」的理論解釋更為精緻一些。賀雪峰強調「農村社會分化」背景下, 受到關注的抗爭主要來自「強勢而獲利多多」的失地農民,^⑫無非是相信多數農民還屬於相對穩定的社群類型。然而只要承認農地衝突在當今中國確實仍是難題, 也亟需制度化緩解, 那麼對於維權性社群, 體制邏輯似乎就以兩

註⑩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註⑪ 我自己 2007 年也在河南、甘肅等城郊訪問失地農民。當地農民未必滿意, 但一來村裡社群沒有自治行動慣例, 再則這些村子最低層級的生產隊也有四五百人之多, 呈現為「疏離性社群」。相較之下, 勤村邵巷小隊僅 40 戶 137 人, 凝聚更為容易, 行動相對靈活。而在 2014 年陝南的調查中則發現, 某些地區由於地理偏遠崎嶇、災害頻仍, 特別需要公共財政投入, 對體制依附性高, 因而常見「從屬性社群」。地理環境或生產隊規模與自治力的關係, 值得進一步研究。四種社群類型在本文作為外生變量, 成因解釋委實極度複雜, 限於篇幅, 此處僅提供一些參照思路。

註⑫ 賀雪峰, *地權的邏輯 II: 地權變革的真相與謬誤* (北京: 東方出版社, 2013 年), 頁 219。

種選擇為主：第一是增加連結度，將維權性社群領袖與成員吸納進入政治過程，取得其普遍認可；第二是透過種種策略、能力與手段，削弱社群自治力。一般基層政權若不擴大參與機會，往往選擇後者，恰與「自治下移」的理念背道而馳。農地抗爭的解決過程，也因而呈現為將「維權性社群」成員分化驅往「疏離性社群」的過程，如表 1 箭號所示。本文主旨，正在於展現這個過程動態。

表 1 地權社群形態類型（呈現案例）

		地權社群自治力	
		弱	強
地權社群 與基層體制 連結度	高	從屬性社群 (缺乏自組織能力的農村社群)	協調性社群 (成都村莊評議會)
	低	疏離性社群 (勤村先遷村民、風村的弱者抵抗)	維權性社群 (勤村村民維權抗爭)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體制能力

產權安排與機制受到政府體制決策的牽動。North 的制度理論中，政府作為在暴力具比較優勢的組織，對民衆提供保護產權的服務，同時扮演歧視性壟斷者（discriminating monopolist）的角色，並面對潛在競爭對手的挑戰。^{⑤③}兼具這些性質再加以界定，Acemoglu and Robinson 將政府體制涉入經濟的形式區別為廣納型（inclusive）與榨取型（extractive）制度，^{⑤④}且認為「相較於 30 年前，中國今天的經濟制度縱使廣納得多，中國的成長經驗卻是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產品」，而這種體制是無法長久運行的。不同於現代化理論的是，Acemoglu and Robinson 不認為這種「威權式成長」就會自然導向廣納型政治制度，而需要「菁英階層有意願或內部有力量促使這樣的改變」。^{⑤⑤}問題在於，如果中國迄今仍保持每年 7% 以上的高速增長，體制基本上依然穩定，而我們也願意相信農地衝突是重要的「內部力量」之一，那麼對於這個似乎還「不民主、不廣納」的體制，就需要更加深入理解其性質動態。

西方學者很早就留意到中國政治體制內部的複雜性。在宏觀層次，極權政體（totalitarianism regime）與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類型以降，學者隨改革開放進程提出碎裂威權主義、^{⑤⑥}韌性威權主義（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⑤⑦}碎裂威權主

註 ⑤③ 劉瑞華譯，Douglass C. North 著，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頁 28。

註 ⑤④ 吳國卿、鄧伯宸譯，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台北：衛城，2013 年），頁 467。

註 ⑤⑤ 同前註，頁 472~473。

註 ⑤⑥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註 ⑤⑦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p. 6~17.

義二代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 等概念類型；^⑤也有學者直接描述政權學習、收縮與適應的性質。^⑥這些概念發展凸顯幾個事實：首先，中國政治體制內部存在諸多分歧；其次，這個內部分歧的體制相當程度具備適應情境、化解難題的能力。在中觀層次，Nee 的市場過渡理論曾相信，計畫分配體制在朝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之後，市場力量會逐漸替代政治體制對於資源的重分配權力，使得政府角色淡化，並在制度決策中趨向市場經濟安排。^⑦然而實際上，地方體制權力往往未隨市場經濟發展而釋出對資源的層層操控。Nee and Ingram 在隨後著作中嘗試加入社會脈絡的因素修正。^⑧相較之下，Oi 的「地方國家公司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 似乎是較為貼切的詮釋。^⑨她認為地方政府扮演企業組織角色，並以集體所有的手法與公司化經營特色，使基層政權以法人形態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企業型政府面對正式制度，受到地方非正式限制形塑，^⑩同時處於一種壓力型體制 (pressurized system) 格局，亦即「一級政治組織 (縣、鄉) 爲了實現經濟趕超，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指標而採取的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評價體系。爲了完成經濟趕超任務和各項指標，各級政治組織 (以黨委和政府爲核心) 把這些任務和指標，層層量化分解，下派給下級組織和個人，責令在其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然後根據完成的情況進行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獎懲。」^⑪這是一種從上而下、垂直層層施壓的體制圖像：它一則誘導地方政府對產權積極進行界定、轉制與重組；再則透過關係與統計手段來規避壓力。「壓力」主要來自上級政府，而面對產權安排過程中遭遇的反彈，它需要不同的減壓機制與能力來保護整個體制，包括相對於基層體制的高層如省、地級政府。

Yongshun Cai (蔡永順) 對政府因應社會抗爭的解釋指出：中央與地方政府會依據不同目標、利益，以及處理事件的成本效益，採取相異策略。中央可將處理社會抗爭的權責分給地方政府，一方面處於容易卸責的位置，另一方面可在獲取較充足的訊息

註 ⑤ Andrew Mertha,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 Political Plur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00 (December 2009), pp. 995-1012.

註 ⑥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註 ⑦ 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54 (October 1989), pp. 663-681.

註 ⑧ Victor Nee and Paul Ingram, "Embeddedness and beyond: Institutions, Exchange,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pp. 19-45.

註 ⑨ Jean 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October 1992), pp. 99-126.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也被譯爲「地方國家統合主義」。這裡採用陳志柔的譯法，凸顯地方政府的公司法人邏輯。陳志柔，「中國大陸農村財產權制度變遷的地方制度基礎：閩南與蘇南的地區差異」，*台灣社會學*，2001 年第 2 期，頁 219-262。

註 ⑩ 陳志柔，「中國大陸農村財產權制度變遷的地方制度基礎：閩南與蘇南的地區差異」，頁 219-262。

註 ⑪ 榮敬本等，*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頁 28-35。

後，再行介入。^⑥周雪光則認為，中國的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中央與地方間、集權與放權間的矛盾交替往復，只能在動態中尋找暫時的平衡點。^⑦那麼，「壓力與規避」、「卸責與介入」的交替往復邏輯為何？周黎安的「行政發包制」(administrative subcontract) 概念，強調行政權分配、經濟激勵和內部控制三個維度上呈現相互配合和內在一致的特徵，^⑧相形之下，更有助於以「成本壓力」、「績效誘因」、「契約」和「層級」等元素來具體定位體制動態。郭亮曾以類似的「行政包乾制」解釋農地徵收過程，並推斷「從長遠來看，『行政包乾制』中普遍存在的利益激勵導向消解了基層組織的公共性，並非一種穩定的治理機制」。^⑨不過這主要聚焦於基層政權與村委會的關係，較為忽略地方體制「動態卸責」的能力、策略與過程，也未針對基層社群類型作更多區分——這就可能低估某些情境的穩定狀態。本文仍借用行政發包制概念理解地方體制：這個體制機制主要是（但未必限於）省級以下各級政府。上級具有向下施壓榨取性質，下級仍具某種裁量主動性，以爭取績效，卻也面對基層反饋產生的成本，不易一意孤行，而成本壓力與績效誘因構成各層級間不斷施壓卸責、衝突摸索、在自願與強制間重組契約的過程。

體制不斷應用與學習群眾工作、媒體宣傳、信訪制度、暴力鎮壓，以及行政層級重組等策略與機制，且須適應基層微觀情境。Lee and Zhang 透過微觀視角，描寫出地方政府部門對於社會抗爭力量的吸納方式，包括抗爭的談判、法律科層的吸納、以及恩庇侍從的結構，^⑩而「地權社群」的形態與行動，構成重要的微觀情境類型，牽動地方體制策略。面對地方政府產權強制力，自認受損的地權社群在行動過程中，信訪維權常是被考慮的行動形式。信訪意謂「信件」、「走訪」的請願形式，是一種具中國特色的政治參與管道，各級政府部門也多設有信訪辦公室，專責接受民衆信訪。應星指出：「1949 年後，由於科層化片面發展的現實與人民民主的理念、廣泛的社會動員與穩定的社會秩序之間構成了某種內在的緊張關係，通過上訪聲討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解決各式各樣的『遺留問題』的『委屈訴苦』就成為化解這種緊張的一個重要途徑。」^⑪2005 年國務院通過施行《信訪條例》，使信訪形式更加制度化，然而，實際上仍難以成為民衆參與政治決策的途徑，而只是在特定情況下疏導民怨的方式。對於各級政府，信訪制度是化解基層壓力的一種減壓閥，也時有因缺乏實質作用而使壓力

註⑥ Yongshun Cai,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 Why Popular Protests Succeed or Fai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註⑦ 周雪光，「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開放時代*（廣州），2011 年第 10 期，頁 67~85。

註⑧ 周黎安，「行政發包制」，*社會*（上海），2014 年第 6 期，頁 1~38。

註⑨ 郭亮，「土地徵收中的『行政包乾制』及其後果」，*政治學研究*（北京），2015 年第 1 期，頁 114~125。

註⑩ Ching Kwan Lee and Yonghong Zha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8, No. 6 (May 2013), pp. 1475~1508.

註⑪ 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315。

以更極端的方式呈現。

媒體輿論也是重要的行動場域。中共對各級媒體的管控堪稱嚴密，主要手段包括媒體批准登記制、將傳媒業納入黨政官僚的政治等級序列、建立審讀制度、由宣傳部門確定報導重心、並隨時頒布各種禁載規定等。^①在官民衝突中，各級媒體為事件定性，為政府表態。村民也試圖利用媒體輿論將消息傳達至各界，期望引起共鳴，進而對地方政府產生壓力。呂德文曾以江西宜黃拆遷衝突案例指出：媒體輿論可能有助釘子戶的抗爭轉化為專業化的社會運動，甚至出現「反體制」效果。^②儘管如此，在城鎮化浪潮所引發成千上萬的土地維權中，^③能夠透過媒體形成專業社會運動、引發廣大輿論迴響的畢竟是極少數，徵地拆遷的效率一般高於遭遇的障礙，也成為中國快速城鎮化的背景。在對媒體資源公開正式的競爭中，村民通常處於弱勢，因而只得另覓他途，包括訴諸互聯網或國際媒體。大多數聲音難免湮沒於媒體控制手段裡，一旦消息傳出，往往事件已經演變得非常激烈，甚或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依據前文表 1，在農地徵收過程中，倘若存在自治力較強的地權社群，與既有基層行政集體的連結度不高，則傾向在互動中出現維權性。而衝突耗損中現身的維權性社群在不同情境下展現相異的行動狀態，與體制決策能力分別動態調整範圍與策略：當地權社群的維權性初步萌生，體制尚未啟動相應的策略能力，呈現為零星衝突與協商（表 2 左下）。這種狀態逐漸形構一個產權意識更一致、行動更明晰的地權社群，積極結盟採取上訪抗爭。基層政權在被動截訪的同時急於分別協商，同時遭致上級壓力（表 2 右下）。地方體制層級不斷在情境中求索、適應、學習，常表現為軟硬兼施、虛與委蛇。一旦掌握充分策略訊息，體制能力逐漸強大，所用手段也更加多元。除了暴力威嚇、信訪封鎖、宣傳媒體操作、也試圖透過行政手段廓清體制權限能力（表 2 右上），旨在將維權性社群分散瓦解至表 1 的其他社群類型。一旦成功使社群分化、窄化、虛化，行動趨於分散隱蔽，體制整體的自我保護也步入常軌。這是理解勤村事件進展的動態邏輯，而這個框架也具備推展應用於其他案例的潛力。

註① 何清漣，*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2006 年），頁 117。

註② 呂德文，「媒介動員、釘子戶與抗爭政治－宜黃事件再分析」，*社會*（上海），2012 年第 3 期，頁 129-170。

註③ 前述于建嶸的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課題組，取得的農村土地進京上訪信就有 837 封之多，而上訪原因涉及土地者有 73.2%。另外，中國社科院社會所課題組的調查指出：「2008 年，信訪量明顯增加，僅全國民政部門，第一季度接受信訪 14 萬人次，第二季度 31.4 萬人次，第三季度 44.6 萬人次，總計 90 萬人次，而 2007 年全年為 81 萬人次。全國群體性事件在 2005 年一度下降，但從 2006 年起又開始上升，2006 年全國發生各類群體事件 6 萬餘起，2007 年上升到 8 萬餘起。2008 年的形勢仍不容樂觀。」若這些數據中確實有相當比例來自農地糾紛，再參酌前引 2014 年 8 月新華社報導，那麼「成千上萬」的推測應該不算誇張。汝信、陸學藝、李培林，*社會藍皮書－2009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表 2 地權社群與行政體制能力——理解勤村事件的動態框架

		地權社群行動（括號內為進入類型的事件）	
		模糊分散	明確集中
體制減壓策略能力	強	穩定壓制型 （強拆鎮壓過後） 社群：幾乎全部轉移，以弱者抵抗為主，亦有少數從屬者 體制：媒體信訪控制與行政降級策略落實常軌	多元壓制型 （宣佈行政調整廓清權限） 社群：維權性社群外圍逐漸轉移為其他類型，社群核心訴求抽象化 體制：媒體信訪控制、威逼利誘、政令虛耗、行政調整，各種手段齊出
	弱	零星衝突型 （糾紛開始） 社群：分別協商、表達不滿、推舉自治領袖、嘗試研究法令、分享知識 體制：承接命令、倉皇匆促、粗糙工作	群體維權型 （正面衝突） 社群：連署捐獻、推派上訪代表、積極維權 體制：宣傳、截訪、妥協與摸索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肆、勤村案例考察^④

一、勤村背景——弱連結與自治力

勤村域內村落歷史至少可溯及宋代，近年人口約維持在兩三千。1949 年以前，大致分作幾個自然村，如東村、西村、陳村、管巷等。1950 年代，OT 鄉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公社組織編制，將幾個自然村歸併成為公社轄下大隊，成為現今勤村。勤村大隊範圍內自然村的眾多鄰里，又被進一步畫分為 18 個生產隊（小隊），並且各自設有小隊長，負責監督與協助執行計畫經濟體制下的集體農業生產。1980 年代，各地農村紛紛告別公社制度，OT 公社也改制為 OT 鄉政府，並且在 1993 年再改制為 OT 鎮，直到徵地前併入 Q 鎮。隨著公社取消，大隊改制為行政村，勤村 18 個生產隊也各自成為村民小組。不過，村民日常生活話語中，依然以公社、大隊、小隊來稱呼這些組織。至於傳統東村、西村、陳村等界分方式，雖然仍常在口語中提及，但是並沒有任何幹部組織，也不在行政區劃中，屬於正式體制外的社群劃分。

村廣人眾的勤村裡，各級幹部職能運作形態始終未曾出現劇烈變動，「強政府」的地方背景下，村內領導幹部一直傾向扮演承接行政命令的角色，與上級關係交好，在職位選派過程中，也一向受到基層政權充分掌控，和村民連結並不密切。至於村內組織幹部，情況各有不同，但大致穩定規律。公社時期，各個小隊長負責對村民發放上級通知、督促執行集體生產，同時也代表村民向上級反映意見。在大隊改制為行政村、小隊改組為村民小組之後，推選小隊長的慣例延續不輟，只是包產到戶之後，農

註 ④ 本節內容採自作者所訪談與蒐集獲得的資料，以及田野參與觀察中的筆記。主要田野調查時間是 2006 年 11 月、2007 年 5 月至 8 月。其後每一兩年回訪，迄今保持聯繫。

業生產不再亟需集體鞭策，小隊長職位也越來越無足輕重，而被村民戲稱為「擺設」。儘管如此，村內小隊長職位的推選仍持續由各小隊各自不定期舉行。通常由村委會指派幾個候選人，然後經小隊裡村民投票選出。直到 2000 年，小隊長職位才被正式撤銷。

表 3 勤村組織架構概覽

公社	大隊	傳統自然村	生產隊（村民小組）
OT	勤村	東村	山北、山南、街里、邵巷、袁巷、椿樹巷、小東店、大東店、長巷
		西村	西一、西二、西三、西四
		陳村	河西巷
		管巷	韓巷、管巷
		秦家漕	秦家漕
		其他	方橋
	風村、舜村、洋村、稍村等其他大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這種推選活動看起來極為受限，不是村民自治的理想狀態，更難以論及民主政治的意義。然而事實上，在小隊長職務選舉的起落過程中，某些小隊已然展現政治參與的傳統、意識、習慣與熱情，具備突出的自治力與自組織能力。例如邵巷小隊，就曾對選出的小隊長感到不滿，甚至集體要求村委重新指派候選人供他們選擇。對這些村民而言，能擁有為自己行使政治權利的代表，似乎還是重要的。他們重視這個仍然存在的職位，以及它有機會發生的功能——即使許多村民仍然戲稱它為擺設，包括部分後來抗爭的核心成員。而在徵地事件前後所發生的現象，也將再度承繼這個共同注重自治參與權利的社群特徵。

二、徵地事件的展開與地權社群行動的浮現

（一）行政壓力與零星衝突

2005 年，OT 鎮併入 Q 鎮之後，X 市政府公布了職業教育園區規劃方案，旋即正式動工。隆重的奠基儀式中，身為省委常委的 X 市委書記親自蒞臨剪綵，宣佈園區首期開工。X 市長致祝賀辭，市裡其他重要領導大都到場觀禮。尤有甚者，省教育廳副廳長、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也都到達現場參加儀式。冠蓋雲集的盛大場面，充分顯示即將開展的項目深受省、市的高度肯定與重視。儀式過後，當地新聞媒體大幅且詳細地介紹了職教園區的構想與規劃內容。而勤村位於園區主要區域，面臨全村拆遷，被喻為第一期工程的「主戰場」。幾天內，鎮政府拆遷人員就直接進入勤村測量耕地與青苗，並且同時執行鄰近「風村」農田徵收工作，準備用以興建勤村安置房。此時，勤村與風村的村民都已產生一些疑慮，要求拆遷人員出示徵地批准文件，以及具體補償和社會保障條件，但拆遷幹部遲遲沒有提出令村民滿意的回覆，致使部分村

民開始蘊釀抗爭。一些村民表示，原本的村書記知道村民反彈後，曾試圖向鎮裡商談補償，但因而得罪上級遭到撤換。另一些村民則稱說，他是拿了好處之後走人的。無論如何，幾乎從事件一開始，村裡實際權力以及補償運作，就已經落入村主任的一手掌控。而村主任則完全配合地方政府命令行事，與村民連結薄弱。這時許多村民意識到，無從期望村內行政集體來談判補償，只得自尋出路。而勤村裡權利意識一向較強、關係較為緊密、極具自治力、以邵巷為核心的村民，此刻寄望於數十年來幾乎已失去實際功能的小隊長職位，臨時自發推選出新的小隊長，也就是村民們暱稱為「老丁」的丁初，期望他帶領邵巷村民——事實上是東村為主的全體勤村村民，共同維權。這些村民開始至新華書店尋找書籍、學習農地徵收和拆遷相關法令、上網求援，並且口耳相傳維權知識。社群的「維權性」已開始顯露。

2005 年 8 月中，在村民聲聲催促下，地方政府仍然拿不出任何批准文件，也無法提出令村民安心的補償安置與社會保障條件。對村民指控顯得有些措手不及的 X 市政府，匆促向省國土資源廳呈上數份《建設用地項目呈報說明書》，並在 2005 年下半年連續獲得省國土資源廳回覆《關於批准 X 市 H 區 2005 年度第 2、3、5、6、7、8 批次城鎮用地的通知》共六份通知文件。然而這些文件再度引發村民爭議：7 月 8 日第一期工程動工，隨即開始測量土地與青苗時，省國土資源廳尚未批准任何一個批次。第一和第二個批次（編號 2、3 號）分別在 9 月 13 日與 8 月 18 日獲得批准，時點互相錯置，被質疑可能經過修正與補發。而接續四個批次全是在 12 月 27 日一天內批准，更令村民感到不解。村民認為：從 7 月宣布開工，到 8 月初拆遷人員進入村內測量土地青苗的徵地前置工作，地方政府都無法拿出任何可供村民參考的批准文件。而 8 月中到 12 月底的六個批次批准通知，則顯得混亂倉促，流露地方政府執行工程項目「先斬後奏」的徵象。這使得 2005 年 7 月到 2006 年初的半年期間，大多數村民已陷於一種不安、不滿、疑慮的情緒當中，對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感和拒絕妥協的行動決心越來越強烈。

2006 年初，地方政府總算公布省國土資源廳的批准文件，並且追加園區規劃面積。不過村民研究法規後，卻堅信以此開發規模的整個規劃項目應該交付中央，經由國務院批准才能符合法定徵地程序。村民未被省政府六個批次文件說服，認為地方政府根本違法徵地。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嘗試提出的補償與安置方案仍使村民不滿。首先，土地補償費與安置費仍沒有著落，而興建中的安置房，將以政府估算房價與村民原本住房估價結果相比較後，要求村民補繳估價差額，但村民認為幹部往往刻意低估舊房價格、高估新房價格，使村民需額外負擔可觀費用；再者，市裡撥下的部分安置費用照規定加入社保基金，但照規定應有 15 年社保費用，地方政府卻只負擔 10 年，剩下 5 年保費需由村民自行負擔。當相關知識在社群內流傳分享，村民普遍難以接受，零星衝突也開始發生。

（二）初次暴力衝突與群體維權行動

從 2005 年 7 月，X 市就開始主導關於規劃項目的說明與宣傳。到了 2006 年 2 月，地方政府還是沒能提供令村民滿意的補償與安置標準，也未調整決策迎合村民訴求，仍只是繼續大力正面報導，單方面加強說明建設職教園區的理由，試圖強調政策合法性，成為 X 市對民間傳遞訊息的主旋律。另一方面，區級以下行政單位則是馬不停蹄承接上級命令，積極展開徵地拆遷。3 月 8 日前後，H 區拆遷辦將拆遷補償安置通知書發放給村民。然而，這份通知書裡完全沒有提及任何補償安置條件改進事宜，僅僅寫明拆遷實施單位以及拆遷範圍。村民向政府幹部表示應當依法行事，鎮幹部卻口頭回應道：「你們這是咬文嚼字，鑽牛角尖。不要跟我講法律。」粗糙拙劣的體制工作一再激化幹群緊張關係，也促進村民團結，並以邵巷為核心的社群關係展開行動。

2006 年 3 月 23 日中午，鎮拆遷辦人員帶著一批來路不明的人士強行進入勤村，^⑤封鎖附近通道，著手拆遷，終於與積怨已久的村民發生激烈衝突。勤村 2 千多名村民，有 1 千餘人參與其中，其中 10 餘人遭到毆打受傷。此事震驚當地群眾，勤村幾位村民在慌亂恐懼中記下當天事件始末，並且考慮共同委託代表，嘗試透過上訪維權制衡地方政府、換取談判空間、實踐產權利益。村民經過協商，決定推派邵巷小隊長丁初（老丁）、山北小隊的丁毅（小丁）、以及鄰村風村的馮興（老馮）作為代表，前往省府相關部門上訪。全村以各組各戶為單位，開始熱烈進行簽名聯署與捐款，為三位上訪代表籌集路費。大多村民捐出 10 元，也有一些捐 5 元、20 元或更多，總共募集到 8、9 千元。僅有「西三」小隊因為是村主任所屬小隊，特別受到監控，因而沒有村民參與簽名捐款。三位村民代表帶著 17 個小隊捐助的旅費，背負著村民期望，開始上訪旅程。而整個正面衝突、串聯擁戴、文書起草、畫押捐獻的過程，則意味村內「維權性社群」的公開集中行動正式浮現，事態從表 2 左下的「零星衝突型」走向了右下「群體維權型」。

三位村民代表首先到了省政府國土資源廳，述說事件來由及村民訴求。然而省國土資源廳的人員很快就表示：「這事情，省政府是搞不成的。」三人在省會待了整整 6 天，嘗試了各種管道，確定沒有什麼進展的契機，又不甘心事情遲遲沒有解決跡象，於是決定直接搭火車前往北京，往中央去上訪。他們警覺地方政府照慣例很可能「截訪」，於是相當機敏地在北京的前一站下車，還在下車後對路線周邊環境仔細偵察了一番。為了免於遭到截訪人員一網打盡，三人各自帶著一份信訪材料，分頭進入城區，再行會合。經過一連串煞費苦心而極其迂迴的過程，三位村民都平安到達北京的「國務院與全國人大」信訪辦，將信訪材料順利呈交給接訪人員。這份材料開頭就直指中央，並且具體提出兩點主要指控：「第一、徵地補償不到位，安置不落實；第二、徵地程序違法，越權批地，土地未批先用。」

註⑤ 村民表示，當地政府的拆遷慣例就是收買 A 鎮的黑道去 B 鎮打人、收買 B 鎮的黑道去 A 鎮打人。

這些訴求當時確實獲得中央接訪人員的正面回應與認可，並且承諾向地方政府給予壓力。在訪談中，老丁表示鎮長曾承認 X 政府的貸款因這次上訪行動而遭到國務院凍結，評估補償也比其他村多了些。雖然這並沒有確切管道可以證實，然而有兩個現象發展比較明顯：首先，中央政府已收到事件訊息，並且某種程度造成地方政府的疑慮與壓力；第二，在老丁三人回到村內後，較長一段期間未再發生任何暴力衝突事件，地方政府人員與村民對於補償安置條件的協商，也開始分別展開。4 月 28 日，勤村村委會在一张便條上草草寫了一份「承諾書」，交給村民收執。這份蓋了村委會公章的承諾書寫著：「本村土地補償款、社保後多餘的資金到村帳戶後，分配方案經協商決定，股份制或現金分配到村民，特此承諾！」這份承諾書雖然自始就不見什麼約束力，也沒有滿足村民訴求，但在暴力衝突甫滿一個月的當時，似乎可以視為基層單位態度軟化的一個跡象。地方政府的粗糙手段確實開始有所保留，產權執行形態也暫有轉變。此刻「維權性社群」涵蓋較廣的差序關係範圍，而有明確的行動。面對如此事態，地方各級體制正努力摸索化解壓力的策略與能力。

三、地方體制策略能力展現與多元壓制^⑦

經過暴力衝突與進京上訪，地方政府面臨中央施壓的疑慮，以及村民公開集中的抗爭，比較願意分別與村民協商補償安置條件，也全力摸索處理壓力的策略與能力。作為維權性社群，此時部分村民對中央政府或境內外媒體「主持正義」的效能抱持期望，而繼續留守村內。但也有些村民在策略博弈過程中，開始對地方政府施展策略能力的潛能抱持恐懼與妥協的態度，這讓維權行動基礎從「社群關係外圍」開始窄化。部分村民加緊與地方政府人員和談，並承諾遷往即將完工的安置房社區—儘管多數村民對趕工建成的安置房品質都深表不滿與憂心。5 月開始，地方政府透過幹部的群眾工作，加強拉攏不願妥協、在地權社群關係中也相對邊緣的村民，而這些村民在 4 月的上訪行動中，都曾簽名連署並捐款支持。韓巷小隊村民陳根就舉例：「袁巷的屠興後來被拉到了大隊裡（參加工作）！韓巷的韓琪，大隊裡給了好處，就不再支持了。」勤村村民在態度與決策上也發生「差序」。傾向妥協的村民一部分成為地方政府加強吸納的對象，在 Lee and Zhang 所謂「花錢買穩定」的邏輯下走向社群的「從屬性」，更大一部分村民對體制比較疏離，勉為轉往安置區進行「弱者抵抗」—雖然此時在原村內，地權社群行動依然公開明確；堅決留守維權抗爭的村民漸次減少，當中領袖也成為地方政府加強威脅利誘的對象。在暴力陰影與進京上訪後的平和狀態之下，地方政府與社群行動持續角力。

拒遷村民在暗潮洶湧的平靜表象中僵持留守了半年多。村民指出，在這期間「園區被降低了行政級別，從市級變為鎮級」。檢閱公開文件未見緣由，但如前文所述，園區建設初期受到省委、市級領導高度重視，而公開資料中原本園區號稱「在體制上也

註⑦ 在 X 市其他案例的田野研究中，曾發現維權律師和維權領袖要求村民簽下盟約，以確保地權社群的維繫。但是在勤村並沒有發現這樣的事實，勤村的地權社群似乎仍以自發自治為主。

有所創新，採取市區結合、以區為主、入園學校參與的模式進行運作」，市委市政府還特設園區建設專題組，其中「發改委負責資源整合，市教育局成立辦公室協調園區建設，勞動和社會事業保障局牽頭實施公共實訓基地建設」，此時忽然提出「Q 街道」將改為與園區實施「街園合一」，主要行政部門層級也僅為「副科級」，似乎都透露園區相關事務在體制級別與重要性遭到下移，省、市甚至區級幹部也從而逐漸隱退幕後。

行政權限下移、廓清，更意味地方政府對體制能力策略已有較為明確的掌握，反映事態導往「多元壓制型」。能力策略不斷積累的地方體制，一面強化群眾工作開啓補償安置協商、拉攏分化村民，一面著手調整媒體宣傳控制策略。原本主要強調規劃方案的公共利益與地方產業發展需求，此刻則有意凸顯被拆遷村民的妥協潮流。譬如 2006 年 5 月 26 日，H 區委機關報頭版右下方一則報導，標題為「建設職教園區，我們全力支持—Q 鎮村民拆遷簽約一瞥」，極力強調村民對於建設的配合。這類報導自然不曾提及此前種種糾紛衝突，也淡化當時許多村民在不滿恐懼中妥協的事實。至於仍有許多村民留守拒遷的僵局，乃至抗爭上訪行動，更被刻意忽略了。拒遷村民後來上訪維權所遞交的材料當中，也具體指出報導內文被蓄意營造、照片中的村民是臨時演員。相較之下，村民缺乏透過媒體輿論傳達意見的相應管道，只能四處請託鄉親朋友，嘗試將訊息傳達出去。而他們格外期望境外媒體支援，只因為聽聞傳言「其他鎮被徵地的村民找到了外國記者，外國記者在溫家寶巡視的場合，向溫提起了那件事，事情因而獲得解決」，便盼望也遇到境外記者。

被削弱的維權性社群行動依然鮮明，而開始更致力「遵照國家規定精神」演示維權行動，包括在村內要道布置起各種相關意涵的標語，包括「維護中央權威，保證政令暢通」、「反對訴諸暴力」、「還我合法權益」等等；各家屋頂上則高高掛起紅旗，表明擁護共產黨的立場。這些作法無一不是強調社群乃是「依法維權」，期望中央能夠成為自己的後盾，然而實際上，村民對中央「主持正義」的疑慮越來越強烈。直到 2006 年 11 月，留守村內拒絕搬遷的，終於只剩下 10 戶，總共 30 餘人。這就是在多元壓制削弱後的維權性社群核心。見表 4：

表 4 多元壓制期間的維權性社群核心

戶長	所屬小隊	身分
丁初（老丁）	東村邵巷	進京上訪的代表之一，抗爭主要領袖
丁清	東村邵巷	丁初之兄
夏振	東村邵巷	丁初的表弟
夏平	東村邵巷	夏振的堂兄
章海	東村邵巷	
徐明	東村邵巷	與徐洪是兄弟。圖1周碧之夫
徐洪	東村邵巷	與徐明是兄弟
丁毅（小丁）	東村山北	進京上訪的代表之一
周鳳	東村街里	老丁家南側鄰居。2007年初先搬遷
陳拱	陳村河西巷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這 10 戶村民自始作為地權社群核心，共同進行類似的產權實踐，也以較為集中明確的行動持續抗爭。而從表 4 可以發現：這些村民能夠堅持留守抗爭，與村莊社會關聯強度很有關係。10 戶之中，有 9 戶位於東村，7 戶在邵巷小隊。而不屬邵巷的 3 戶當中，山北的丁毅曾與老丁一同代表村民進京上訪；而街里的周鳳住房位於老丁住房的正前方，僅僅相隔一個小池塘，地緣關係極為密切。如圖 1 所示。再者，邵巷小隊原有 40 戶 137 人，組織運作一向靈活。在勤村 2 千多人中，抗爭比例也明顯較高。^⑦前文提及，邵巷原本就是村內政治參與意識較強、村民彼此關聯也比較緊密的小隊，而老丁則是徵地事件發生之初，邵巷臨時推選出的維權領袖——後來也成為整個勤村維權社群的主要領袖。圍繞老丁家與邵巷小隊的差序格局社會關聯，構成彼此傳遞訊息、從事維權行動的社群核心，成為地方政府策略與能力一時難以壓制的障礙，儘管社群基礎正隨著體制策略能力的增加而耗散。

圖 1 概略的勤村平面圖



資料來源：作者田野筆記。

四、多元壓制進入穩定常軌

(一) 強制拆遷

園區工程持續進行著。2007 年 1 月中，老丁和其兄丁清收到一份《X 市 H 區人民政府文件》，標題為「X 市 H 區人民政府關於對 Q 鎮勤村東村 XX 號房屋實施行政強制拆遷的決定」。此令一下，暴力拆遷的疑慮與急迫性立刻重新浮現。丁清急忙在 1 月 21 日草擬一份文件，同時寄發給 X 市長以及 H 區長，老丁也隨即在 1 月 22 日再擬了

註⑦ 可參見前註⑤。

一份文件，逕寄時任中紀委書記吳官正與公安部長周永康，內容與之前進京上訪的材料大同小異。不過這次都沒有獲得任何回應。在這些顯然越級的信件之外，1 月 27 日，老丁和丁清也重新回到基層體制管道，再度針對 H 區政府進行信訪。然而區政府拆遷辦約 10 天後就發下文件「關於丁初（作者註：老丁）丁清房屋拆遷補償信訪問題的函覆」，正式駁回老丁和丁清的訴求，並且依據這份文件向 H 區人民法院申請執行強制拆遷。不過，村民一連串自救手段倒也不是全無作用。2 月 25 日，H 區人民政府又發下一份文件「X 市 H 區人民政府關於撤銷強拆文件的決定」。區政府如此發送與撤銷拆遷令，反覆竟達三次，使村民無所適從，疲於奔命。這段期間，只有地緣關係而無血緣關係、對法規也較不熟悉、差序相對邊緣、性格較為溫和的周鳳一家決定搬遷，社群行動進一步窄化而趨激進。3 月 29 日，老丁與丁清向 H 區法院寄出拆遷前最後一份信訪文件，陳詞可謂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刻意將層次提高到「人民應有的權利」與「法治高於政府」的抽象理念。社群核心人物依據正式法規與政治論述，仍不願絲毫妥協。

2007 年 4 月 4 日午夜，老丁和妻子朱秀在家中沉沉入睡。凌晨 1：30 左右，忽然外頭一陣騷動，兩人被丁清在屋外的呼救聲吵醒，趕緊出門察看，一看不禁大驚失色。原來區政府趁夜派遣警力以及拆遷人員，意圖對拒遷村民住房進行通宵強拆——而以老丁與丁清首當其衝。隨後，丁清、朱秀、以及老丁的年邁父親遭拆遷人員強行拖出，並由另一批人員進入屋內打砸。此時老丁奮力爬上屋頂，以磚瓦攻擊屋下的拆遷人員。警方則在樓下縱火，並以水柱攻擊老丁。事件一發生，其他村民也都驚醒並開始求援。消息很快傳到安置小區，以及小區附近的風村。曾與老丁併肩抗爭的風村村民老馮，帶領先前遷往小區的勤村村民們，拾起鍋碗瓢盆，在靜夜中大聲敲打吆喝，聚眾一齊趕往勤村。很快地，勤村內外擠滿趕來助陣及聞風前來圍觀的附近村民，人數達數千人。但地方政府顯然也是有備而來，在四周布置大量的警力與消防人員，分隔群眾，官民之間劍拔弩張。老丁在屋頂上反擊，有些村民則衝進屋內毆打拆遷人員，更有警察被村民挾持。房屋上下裡外，棍棒、拳腳、水柱一陣彼此亂攻，頓時火光沖天，煙霧瀰漫。終於幾位拆遷人員與村民受傷的情況下，老丁與幾位村民遭到逮捕，其後被依「妨害公務罪」起訴判刑。

（二）體制能力策略進入常軌

從強拆事件告一段落，事態就進入「穩定壓制型」，維權性社群大體也走向疏離性社群。事件過後，包括老丁在內的多位村民遭拘。而警方則繼續在附近搜捕圍觀人員。老丁的表弟、同樣也是勤村拒遷村民的夏振，認為凌晨拆遷極不合理，當時就在強拆現場錄影存證，但隨即被警方抓捕，並要求交出所有當天實況影片資料。其他進行攝錄的村民大抵如此，使當天的影片資料大都被封鎖銷毀，只有後來執行拆遷的部分片段，由附近一些村民低調留藏。而強拆隔天 4 月 5 日，當地各大媒體迅速通稿報導。即使省、市級領導大都不再公開過問此事，但從新華社直屬的報紙，到省委、市

委下轄機關報，都同時在顯著位置刊載事件訊息，全文內容大致如下：

4月4日晨，X市H區法院組織人員依法對Q鎮勤村東村的丁清和丁初（作者註：老丁）兩戶住宅實施強制拆遷。鑒於丁初家存放了爆竹和汽油等危險物品，H區公安分局為排除危險物品，組織警力配合工作。

在強拆過程中，丁初暴力抗法，持磚頭將一名民警頭部砸傷。後丁初帶領兩名村民爬到自家房屋頂，分別用瓦片及裝有汽油的玻璃瓶點火後向工作人員投擲。隨後，丁初又將點燃的汽油瓶投擲自家房屋引起燃燒。當地消防聯防隊接報火警後，出動消防車前去撲救。丁打電話召集周邊村民到現場，起哄鬧事，放火燒毀一輛正在滅火的消防車，並將一名民警及一名消防隊員扣留。

省、市領導高度重視，市領導迅速趕赴現場，組織當地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研究處理辦法，開展疏導化解工作。經多方工作，並對丁初進行法制宣傳教育，下午4時許，丁將被扣留人員主動放回。隨後，在丁初離開現場後，強制拆遷繼續進行，並順利執行完畢。

所有報紙所刊載的內文，幾乎完全轉載這份通稿。唯一細微差別只有讀者受眾區域較廣的報刊中，註明事件發生的省市名稱。而報導內文之外，各家新聞標題重點及版面配置情況也略有差異。單從版面安排與報導取向可清楚地觀察到：這個事件受到省級甚至中央、從上到下的高度重視，^⑧事件性質則被定調為村民「暴力抗法」。在較高層級報紙媒體的標題上，強調村民暴力行為以及政府疏導措施；而在較低層級、亦即較為接近徵地實際執行的層級，則刻意指出是「依法拆遷」。當地各個主要報刊標題與版面配置概況如表5所示。

表5 強拆事件隔天，當地媒體刊載情況

報紙名稱	所屬單位	標題	版面位置
XD快報	新華社直屬事業單位	拆遷遭遇暴力抗法警方積極疏導化解	A2右上
YZ晚報	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主辦	X市積極處理暴力抗拆事件	A3右上
JN日報	人民日報社主管	X市積極處理一起依法拆遷中暴力抗法事件	
WX日報	X市委機關報	H區積極處理一起依法拆遷中暴力抗法事件	A2左下
JN晚報	X市委晚報	H區積極處理一起依法拆遷中暴力抗法事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⑧ 2014年某退休中央級官員被調查，公開消息指出，該官員的弟弟在勤村事件當時是H區國土局的副局長。這個細節或許有助於解釋：何以一個鄉鎮科級的開發區徵地項目，會得到中央與省級動用行政命令與宣傳機器的鼎力相助。

口徑一致的報導內容，企圖傳遞給各階層讀者的訊息是「政府依法拆遷、村民暴力抗法、政府疏導化解」的事件性質，多數勤村村民都難以接受——無論此刻屬於何種社群，或者是否早早決定接受尚未滿意的補償安置條件。經此一役，許多村民對政府體制、媒體輿論乃至產權法規，都有了全新的理解，除了憤怒無力，也對老丁的處境抱屈。村民陳根不是留守最終的社群成員，也一再直指強拆事件的疑點：「為什麼是凌晨 1：30 來拆房子？為什麼隔天四家大報內容幾乎一字不差？」然而，老丁家人更多還是感到無助無奈，覺得村民不夠意思。朱秀還曾經抱怨丁清「比較怕事」，更反映出留守後期社群內外的矛盾與鬆動。正當村民在質疑與妥協中張羅新生活之際，忽然發現村委會開始在安置社區外圍大興土木建造店面，準備出租經營。店面仍屬「集體所有」，所收的營利也將歸於集體。許多村民指出，這些店面營建的經費來自當初徵地過程消失的補償款。這一切決定不曾經過村民同意，而是由村幹部自行決定，集體往後如何運用營收，一般村民也無權過問。這種未來可能獲利並促進地方繁榮的經營方式，曖昧地呈顯基層政權的企業性質。而 2007 年 12 月，此前提出的「街園合一」終獲落實，Q 鎮正式撤消，改為街道，從此 Q 街道與 OT 園區的事務均限於鄉鎮科級，內設機構均為「副科級」建制，區級之上政府「不再直接承擔園區事務」。

勤村地權社群的公開集中行動已然瓦解，維權行動轉為弱者抵抗，村民與體制回歸疏離。不過之前拒遷村民、早先勉為妥協仍從事弱者抵抗的村民，以及市內其他的維權民衆，仍有許多人持續為遭拘的老丁等村民奔走求援。留守村內期間，老丁透過人際網絡積極尋求援助，雖然曾經因而遭遇詐騙，^⑩但也確實結識一批彼此信賴的朋友、和他們持續來往、互相交流維權訊息與經驗、討論法律條文、尋找發聲管道等。老丁許多關於維權的想法都來自這批朋友。勤村遭到夜半強拆時，他們也趕赴現場，站在稍遠處拍攝到僅有的片段，並且複製分送，共同低調留存。他們持有影片文件等證據，嘗試透過更具能見度的管道進行援救。社群行動受到體制策略與能力抑制，但在城鎮化主旋律中，更多「維權性」社群仍此起彼伏，蠢蠢欲動，並在其他類型、區域的地權社群的彼此轉換和實踐間，共同構成中國大陸農地制度——乃至基層治理的景況動態。

伍、結 論

勤村案例過程機制動態顯示，理解中國大陸近年農村徵地衝突現象，不僅應關注正式法規缺陷、村集體退化，或者村民自治結社不足，更需具體考量鄉村政治社會歷史脈絡、社群和基層行政體制的動態連結，乃至地方體制的策略及能力。本文嘗試超

註⑩ 各地農地衝突案例中，常有人自稱記者、律師、有力人士，向農民詐騙錢財。其中也不乏真記者向基層政府與農民兩面訛詐者。這都破壞基層人際信任，也影響社群求援。在進入農村調查之初，研究者證明自己「不是騙子」往往要花上一番時間精力。境外研究者有時反而較快獲得信賴，但也更易遇到「提供協助」的要求。這帶來研究倫理與方法論上的難題，只能在田野實踐的自我定位中摸索緩解。

越「確權論」、「集體論」與「自治論」的爭辯，在基層社群脈絡形構農地產權的基礎上，提出「地權社群」概念——這是一種圍繞農村土地、以地緣關係為核心的行動社群，而具有對農地產權契約的共識。社群融入傳統社會關係、差序格局、公社制度遺緒、現代性法制規範，部分更具較高的相對自主性，在基層事務有較強的自治與自組織能力。它不等同於行政村或自然村，邊界只能從基層政治生活的長期實踐過程中展現，但或許更適宜作為理解農地產權衝突的參照主體。

依自治力與行政體制連結度區分的四種地權社群類型中，「協調性社群」、「從屬性社群」與「疏離性社群」，對於地方體制而言相對穩定。只有「維權性社群」是為體制帶來立即威脅的社群形態。農地抗爭解決過程，也因而呈現為體制將「維權性社群」成員分化、驅往其他類型的過程，並傾向顯露出與「自治下移」理念和邏輯的內在矛盾。本文展現了這個過程機制動態。自治力較強的勤村邵巷，與基層行政集體缺乏連結，早已潛藏維權性質，一旦產權衝突發生，不免採取回應行動，甚至引領村內其他社群結盟。當社群行動隨著徵地工作萌生，而體制尚未啟動相應策略能力，零星衝突與協商就持續上演。這種狀態逐漸形構一個產權意識更一致、行動更明晰的地權社群，讓全村行動者緊緊圍繞在邵巷周圍，形成社群集體維權的事態，並誘發較大規模的強烈衝突。各級政權處於行政承包體制當中，遭遇強烈衝突與越級上訪，急於分別協商，也不斷在情境中適應、求索、學習、妥協、軟硬兼施，意在限縮地權社群基礎。一旦掌握充分策略訊息，體制策略能力增強，所採取手段也更加多元。除了加強群眾工作、信訪封鎖、宣傳媒體管控、暴力威嚇，也透過行政編制廓清體制權責能力，旨在將維權性社群分化瓦解至其他社群類型，並逐漸使區級以上政府卸除壓力。當策略能力成功窄化維權性社群，使行動趨於分散隱蔽，體制整體的自我保護也步入常軌。

綜而述之，單以正式法律法規中產權的明晰程度、村集體的退化程度，以及村民自治結社因素，都不足以充分理解農村徵地衝突。任何對於政策法規或集體功能的想像乃至決策，也皆需考量基層社群情境，否則可能徒增衝突，反而造成制度倒退及改革瓶頸，例如成都模式農地改革中的村莊議事會等「自治下移」形式，要推展至其他地區情境，或許仍需因地制宜的配套，乃至體制決策的相應調整。地權社群概念的初步提出，無非始於相信這樣一個事實：社群脈絡實踐產權的不同形式，仍不斷呈現在多元的治理與衝突案例中，而進一步的微觀機制類型區分，以及對社群類型的成因解釋，在中國基層政治研究領域，都仍存在更為豐富的理論可能性。

*

*

*

Land Rights Communities and Local Regime's Ability: Understanding the Land Confiscation Conflict in Rural China

Yi-Chun Tao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re are a lot of land-incurred disputes in rural land transformation, especially in negotiating compensation. According to fieldworks in the Qin Village, these property conflicts are not only caused by flaws in formal regulations and arrangements of rural land, breakdowns of collective groups, or the lack of village self-governance association, but by politic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local community's connections with authority, and local authority's capability and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conflict.

The villagers' land rights consciousness is formed under local communities. The author uses the concept of Land Rights Communities to combin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and modern institutions. When land rights communities with capacity of self-governance are in loose association with the local authority, conflicts are mitigated. When conflicts occurred, evolved, and not dealt with properly by authority, Land Rights Communities will restructure and consolidate themselves into stronger entities with more coherent identities and radical activism. Meanwhile, local

authorities are sandwiched between pressure from upper and lower institutions; so they have to explore, adapt and learn how to survive as well. If local authorities have advantageous capabilities and use correct strategies, they are more capable to exercise threat, bribe,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techniques to paralyze Land Rights Communities. In the meantime,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authorities could evade themselves from conflicts, and achieve self-protection for the whole regime.

Keywords: Rural China, Land Requisition, Rights Protection, Land Rights Communities

參考文獻

- 「土地矛盾高發，當防權力侵蝕權利」，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4-08/03/c_1111913649.htm。
-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574736.htm。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修正版本）」，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中國政府法治信息網，<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fgkd/xfq/fl/200409/20040900052441.shtml>。
- 于建嶸，「土地問題已成為農民維權抗爭的焦點—關於當前我國農村社會形勢的一項專題調研」，調研世界（北京），2005 年第 3 期，頁 22~23。
- 于建嶸，「當代中國農民維權活動的一個解釋框架」，社會學研究（北京），2004 年第 2 期，頁 49~55。
- 文貫中，「解決三農問題不能迴避農地私有化」，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 <http://www.cenet.org.cn/cn/ReadNews.asp?NewsID=23813>。
- 王天夫、王飛、唐有財等，「土地集體化與農村傳統大家庭的結構轉型」，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15 年第 2 期，頁 41~60。
- 王福明譯，杜贊奇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
-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綜合課題組，「還權賦能—成都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的調查研究」，國際經濟評論（北京），2010 年第 2 期，頁 54~92。
- 汝信、陸學藝、李培林，社會藍皮書—2009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
- 何清漣，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2006 年）。
- 吳國卿、鄧伯宸譯，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台北：衛城，2013 年）。
- 呂德文，「媒介動員、釘子戶與抗爭政治—宜黃事件再分析」，社會（上海），2012 年第 3 期，頁 129~170。
- 李昌平，我向百姓說實話（內蒙古：遠方出版社，2004 年）。
- 周其仁，產權與制度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 周雪光，「『關係產權』：產權制度的一個社會學解釋」，社會學研究（北京），2005 年第 2 期，頁 1~31。
- 周雪光，「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開放時代（廣州），2011 年第 10 期，頁 67~85。
- 周黎安，「行政發包制」，社會（上海），2014 年第 6 期，頁 1~38。
- 柳建文、孫夢欣，「農村徵地類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及其治理—基於衝突過程和典型案例

- 的分析」，*公共管理學報*（黑龍江），2014年第2期，頁101~114。
- 秦暉，「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與農民權利保障」，*探索與爭鳴*（上海），2002年第7期，頁15~18。
- 秦暉，「農民地權六論」，*社會科學論壇*（河北），2007年第5期，頁122~146。
- 馬健，「南海模式：創新與困局——對南海土地股份合作制發展狀況的調查」，*農村工作通訊*（北京），2008年第17期，頁16~17。
- 張五常，*經濟解釋卷三——制度的選擇*（香港：花千樹，2002年）。
- 張德元，「新型土地租佃制度芻議」，*經濟前沿*（廣州），2003年第4期，頁36~38。
- 張靜，「土地使用規則的不確定：一個解釋框架」，*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3年第1期，頁113~124。
- 郭亮，「土地徵收中的『行政包乾制』及其後果」，*政治學研究*（北京），2015年第1期，頁114~125。
- 陳志柔，「中國大陸農村財產權制度變遷的地方制度基礎：閩南與蘇南的地區差異」，*台灣社會學*，2001年第2期，頁219~262。
- 華生，*新土改：土地制度改革焦點難點辨析*（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年）。
-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賀雪峰，*地權的邏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
- 賀雪峰，*地權的邏輯II：地權變革的真相與謬誤*（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
- 賀雪峰，*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 楊磊、劉建平，「『混合地權』的制度分析及其實踐邏輯——基於Z村村民小組的個案分析」，*社會*（上海），2015年第2期，頁218~240。
- 榮敬本等，*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 臧得順，*謀地型鄉村精英的生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 劉瑞華譯，Douglass C. North 著，*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5年）。
- 劉愿，「農民從土地股份制得到什麼？——以南海農村股份經濟為例」，*管理世界*（北京），2008年第1期，頁75~81。
- 劉憲法，「『南海模式』的形成、演變與結局」，張曙光主編，*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土地卷（第8集）*（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0年），頁69~132。
- 蔡繼明，「中國的現代化、城市化與農地制度改革」，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編，*政治經濟學研究報告——中國農業、農村與農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116~126。
- 鄧大才，「產權單位與治理單位的關聯性研究——基於中國農村治理的邏輯」，*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15年第7期，頁43~64。
- 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 應星，農戶、集體與國家－國家與農民關係的 60 年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
- 黨國英，「以民主自治攻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難題」，*中國農業信息*（北京），2010 年第 7 期，頁 6~8。
- Alchian, Armen A. and Harold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 3 (March 1973), pp. 16~27.
- Cai, Yongshun,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 Why Popular Protests Succeed or Fai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Coase, Ronald,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 No. 1 (October 1960), pp. 1~44.
- Demsetz, Harold,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7, No. 2 (May 1967), pp. 347~359.
- Denzau, Arthur T., and Douglass C. North, "Shared Mental Model: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Kyklos*, Vol. 47, No. 1 (February 1994), pp. 3~31.
- Gordon, Howard Scott,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o. 62 (April 1954), pp. 124~142.
- Lee, Ching Kwan and Yonghong Zha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8, No. 6 (May 2013), pp. 1475~1508.
- Lieberthal, Kenneth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Mertha, Andrew,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 Political Plur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00 (December 2009), pp. 995~1012.
- Nathan, Andrew J.,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p. 6~17.
- Nee, Victor and Paul Ingram, "Embeddedness and beyond: Institutions, Exchange,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pp. 19~45.
- Nee, Victor,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54 (October 1989), pp. 663~681.
- O'Brien, Kevin J.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Oi, Jean,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October 1992), pp. 99~126.
- Scott, James C., *Weapons of the Wea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hambaugh, David,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